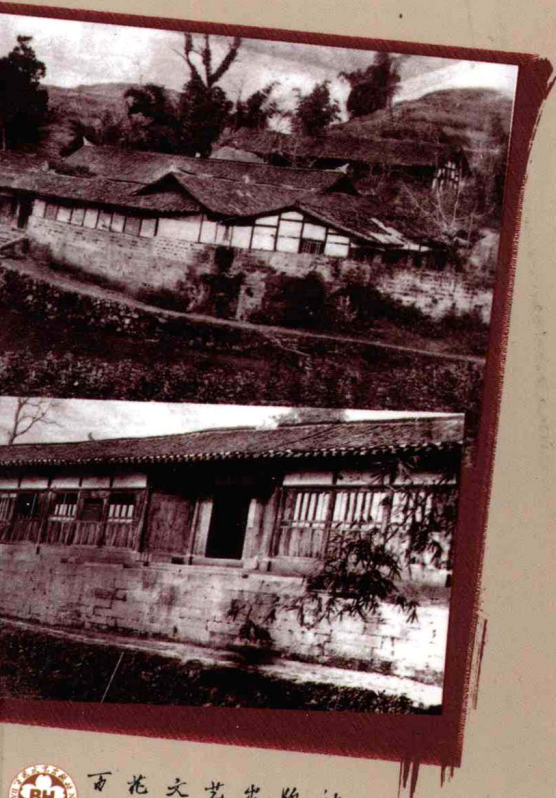


岱峻 / 著

重新解读李庄，发现那批学人顽强地坚守，
有士大夫“忧道不忧贫”的高贵精神
和“文化遗民”的学术自觉，
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更大的原动力则是强烈的民族主义。

消失的学术城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消失的学术城

岱峻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世事翻覆，白云苍狗。一九四六年十月，随着载有最后一批学人的轮船鸣笛起锚，李庄空寂了。一三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那批走出李庄的学人也分崩离析，或去了台湾，或去国离乡，留在大陆的，在左风横行时也噤若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失的学术城/岱峻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306-5174-2

I. 消… II. 岱…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302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5 插页 2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32.00 元

又一次
“衣冠南渡”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首都南京和北平、上海等地一批学术教育机构也一再播迁，先后栖息长沙、昆明等地，最后竟在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县李庄^①落籍。

“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王船山所痛心的“衣冠”实指文明。冯友兰在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道：“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抗战的文化西迁，也是一次悲壮的“衣冠南渡”。长江边上的古镇李庄，当地士绅慨然相邀，民众乡亲热情扶助，在烽火战乱之际，以一方平静，呵护民族的“衣冠”，庋藏国之“重器”。镇上的“九宫十八庙”，乡下的祠堂、农舍，四下分布着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和同济大学等单位。一时间，李庄成了战时中国一座最具影响的学术城。

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学术科研机构，设有十个研究所，人文研究机构大多迁在李庄，长达六年。一批学术大师（本书仿史体例，谨标识人物身份或职务，免去敬称）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梁思成、董作宾、吴定良、凌纯声等，或乘一袭滑竿，或撑一把油伞，行迹匆匆，出没乡间的泥泞。李济博士被学界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李方桂博士被誉为“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凌纯声博士是“中国民族学的开创者”，吴定良博士是“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奠基人”，梁思成被誉为“中国建筑科学之父”……

那时海外邮件，只要写上“中国李庄”便能准确寄达；同盟国的一些科研机

构,也常收到“中国李庄”交换的学术刊物和书籍。印度学者狄克锡曾在板栗坳的史语所,度过一段难忘时光。外国教授史图博、魏特、鲍克兰、史梯瓦特、陈一荻等,跟随同济大学迁徙李庄,波兰籍犹太人魏特教授成了葬在李庄天井山的孤魂。国际友人费正清、费慰梅、李约瑟等曾造访过李庄,并与那里的朋友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童第周等长期保持联系。李约瑟在李庄,为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获取了一批重要史料,从史语所挖走的一个叫王铃的青年,成为他日后重要的合作伙伴……

板栗坳的绿树丛中,掩隐着一座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一大批学人追随之,含英咀华,日复一日,终有所成。“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柏木牌匾,曾挂在栗峰书院的一户农舍门前。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王明、杨志玖、王叔岷等人,就在那里完成研究生学业。王叔岷等北大生,一生都未进过北大校门!

偏僻山村,远离炮火硝烟,但愚、贫、病、匪等魔影,仍会随风潜入,伺机作祟。李庄民智不开,一次“下江人吃人”的讹传,山山水水都放大着惊恐;“太太客厅”的林徽因,是光焰四射的才女佳人,而在李庄月亮田,她是吃尽当光、卧床不起的病人;梁思成的兄弟、考古学家梁思永,胃病、肺病并发,躺在担架上被抬着离开那片土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的两个女儿,两年间相继在昆明和李庄病逝,不幸摧残了中国考古学掌门人的身心,也瓦解了史学巨子陈寅恪去李庄的决心;川南匪患不靖,在刺刀的保护下,那些一心向学的谦谦君子总不免战战兢兢……

身陷泥淖心欲飞。他们坚定地活下来,且放出了异彩。破庙祠堂,民宅农舍,庠序如旧,弦歌依然。一大批人文精英,因有这张战时中国最宁静的“书桌”,而潜心问学,把对家国的忧虑和敌酋的仇恨化为案头的研究和笔下的文章。一批扛鼎之作,如《殷历谱》、《六同别录》、《居延汉简考释》、《上古音韵表稿》、《博物馆》、《远古石器浅说》、《屺些象形文字字典》、《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等,在李庄完成并出版(李庄石印);一批开创性的著作完成了前期准备,如《中国建筑史》、《撒尼傈僳语语法》、《明清档案研究》、《中华民间工艺图说》、《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太平天国史纲》等,其后甫一出版即声名鹊起,至今被学术界奉为圭臬。

世事翻覆,白云苍狗。1946年10月,随着载有最后一批学人的轮船鸣笛起锚,李庄空寂了。二三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那批走出李庄的学人也分崩离析,或去了台湾,或去国离乡,留在大陆的,在左风横行时也噤若寒蝉……地以人传,李庄却是反例。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一座显赫一时的学

术城竟消失得无影无踪。究其原因:当时迁去的单位,都冠有“中央”、“中国”、“国立”的字样。“国家”“中央”,当时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得加上一个“伪”字。于是,阴差阳错,李庄成了一处不堪回首的伤心地。

宛如一道河,也许很长一段是暗河潜流,但终有一天它会择地而出,汨汨喷涌。李庄再也不是一个地理意义的小山村,它是一大批学人一大批学术成果的代称;它的学脉和精神也一直绵延至今。

这些年海外史学界对大陆学界影响大的,有余英时、唐德刚、许倬云、黄仁宇、史景迁等研究历史的新方法新视角。其“新”细一辨析,与梁启超的“新史学观”和傅斯年的“史料学派”,似乎有某种承续关系?语言学是中国率先实现国际化的人文学科。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和代理主任李方桂曾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和副会长。他们的著作,在国际语言学界有很高的“引用率”。张光直研究考古人类学,努力打通东西文化的畛域。他曾是美国耶鲁和哈佛大学考古学教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还兼任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客座教授。在中国,许多人文学者的案头上都能找到他的著作。翻阅那些书页,会蹦出一长串我们不熟悉的名字,如他的师辈李济、董作宾、凌纯声、劳榦、高去寻、石璋如等,这都是些在李庄生活了六年,后去台湾,消逝在我们阅读视野中的人。而今,我们终于知道,张光直、许倬云、李亦园、宋文薰、梅祖麟等一大批学人仍是“李庄”薪火的再传者,今天的学术界仍在吸收着“李庄”的“隔代的养分”……

十多年前,我无意间发现了李庄,发现了一段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重大缺失。发现的过程,纯属偶然。我是个疏于功利的读书人,几十年随心遣兴的阅读,“李庄”这个陌生而暧昧的字符一次又一次地挑动眼帘。我的目光也就开始自觉追寻其背后的历史。2000年,我在《南方周末》上第一次以一个文化人的视角叩访了那块土地。2004年,我的民国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正式出版。此后,李庄开始频现于一些出版物和大众传媒,并变成一处新兴旅游地。我也因此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

这些年,对李庄的重新认识解读,成了我的功课。我逐渐悟到了李庄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以及成为学术城的真正原因。

现代学术得以在穷乡僻壤生根,有民间力量的支持,有学者个人的努力,也有国民政府对“衣冠”、“礼器”的重视。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是对抗战的全新阐释,是对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的重新肯定,也是对那个特定时空文化抗战学术报国的肯定。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从搬迁、安置,到供给、保卫、交通、通

讯,都是有计划有部署,有经费保证和行政措施。国民政府与迁到李庄的学术单位,始终保持着政令畅通;李庄与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始终保持着联系,与海外同盟国的学术机构也互通信息。正基于此,才可以说,学术重镇李庄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文化战场。正如李约瑟所言:“我们这些科学前哨同仁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协助抗战军人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扼制侵略的业绩。”^②

重新解读李庄,发现那批学人顽强地坚守,有士大夫“忧道不忧贫”的高贵精神和“文化遗民”的学术自觉,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更大的原动力则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吕思勉谈到,“民族是世界上早就存在着的,民族主义却必待近世才发达;这就可见得民族主义的发达有一个客观上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外力的压迫”。^③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七七事变”爆发,那代知识分子遭遇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不幸人生。一次次奇耻大辱,一次次民族危机,燃点起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于是他们自觉地把救亡图存当作责任,把学术报国当作目标,把国家民族的崛起视为理想。1928年,傅斯年举起“争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④的旗帜,创建了“史语派”学术集团。“九·一八”事件后,他联络徐中舒、蒋廷黻、李济等,撰写了《东北史纲》(第一卷),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郡县,送交国际联盟调查团,可谓中国知识界“学术报国”的一次主动出击。梁思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就得到美国邀请,还请林徽因同去治病。梁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考古学家李济在南迁途中曾心生犹豫:“我们是否也应该赶赴前线,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他想起欧战爆发期间,英国的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正在考古现场,也想拿枪保卫祖国,然而冲动始终服从理性。于是,李济开导属下和弟子:“既然没有机会表达这种志愿,那么就只有继续做好我们原有的工作。”读书治学,为民族复兴储能,是那批学人的行为理性。研究上古音韵史的青年研究人员董同龢常说:“国家已穷苦到如此地步,还让我们这些研究文史的人有饱饭吃,其实我们这套学问,晚过几十年再研究又有什么不可!”于是他严守纪律,惜时如金,并告谕同事:“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做学问,才对得起前方抗战的将士。”正是有此精神动力,才会在山乡僻野崛起一座现代学术城;历史上一段黑暗时期,竟也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一次机遇。正如后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所说的:“西迁时期中央研究院的情形,无论是初创时,还是1949年迁移台湾以后,均不可比拟。”

重新解读李庄,我改变过去过于仰视的向度。李庄一个小小的地方,有精英学术与乡邦文化的隔膜,有德日学派和英美学派的扞格,有南北学风的歧见^⑤……正是这些隔膜、扞格、歧见,导致了一系列的冲突。就是在中央研究院内

部,也有陶孟和与傅斯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傅斯年与李济在板栗坳演出“全武行”;吴定良苦心孤诣筹备多年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终成泡影;吴金鼎在完成成都王建墓的发掘后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只好负气从军……剖析这些“不光明处”,也彰显着人性的丰富性和学术风格的多样性。君子和而不同,历史的呈现也因此变得波谲云诡。

李庄如一个巨大的迷宫,我越往前行,越多困惑。我是一个以新闻为业的“传媒人”,几十年的实践,悟出一些道理:今天的新闻,未必可以写进历史;而既往的历史恰恰有大量的“新闻”。诚如西哲所言,“要获取新知,就去读旧书”。我尝试“档案派”的研究方法,利用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档案索引,匡正了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叙述,把历史还原到某人的某一天,并尝试着厘清一些事件背后的原因。我欣赏“野史派”的另辟蹊径,注重在日记、书信、回忆录、民国报刊中找寻隐藏的真相;我凭借长期的记者职业训练,重视田野调查,注重口述史的采集。我无数次地叩访李庄,走进一座座破庙和民宅,吸纳残存的文气墨香,寻访一个个亲历者和知情人,找寻不同人对同一个问题的记忆,以及同一个人对不同问题的讲述。在找寻中,辨正去讹,拼接历史的碎片……

当初,汇聚一国之学术精英,产生一批影响甚巨的学术成果,绵延民族的文化血脉——如此重荷,竟由一个小小的村庄担承,这当是空前绝后的历史。要复原那座消失的学术城是一项浩瀚的工程,一己之力实在微不足道。但李庄的前尘旧事,犹如一道干涸的河床,水似流年,一去不返;而嶙峋的礁石,退潮后的水迹仍历历在目,仍可看到镌刻其上的涛声、桨声、呻吟声和船歌声……

注 释:

① 今属四川宜宾市翠屏区。

② 《科学前哨·自叙》1948年出版。

③ 吕思勉:《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原刊《学林》第2期,民国二十九年出版。

④ 傅斯年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⑤ 代表南方学风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后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代表北方学风主要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目 录

001

略

四

又一次“衣冠南渡”(代序) / 001

第一章 漫漫南迁路 / 001

一、战前十年 / 001

二、暂驻足衡山湘水 / 007

三、昆明两年 / 010

从城里到龙泉镇 / 010

“化外之区”的新发现 / 014

狼烟又起 / 017

四、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 017

五、行难居不易 / 020

第二章 新学术的拓荒牛 / 027

一、卧病倒床 / 027

二、此虽旧域,其命维新 / 029

三、白色的反思 / 033

四、桂花坞傅家 / 035

五、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040

第三章 谦谦君子 甲骨狂人 / 045

一、代理所务 / 046

二、殷历谱 / 049

三、甲骨二堂 / 052

第四章 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 / 056

- 一、读书种子与图书馆建设 / 056
- 二、文化劫掠与衣冠南渡 / 058
- 三、图书管理 / 059
- 四、深山藏书城 / 062

第五章 困厄与突围 / 065

- 一、贫病煎迫 / 065
- 二、谣言与刺刀 / 072
- 三、待人与律己 / 077
- 四、治学与入仕 / 082
- 五、撒在山野的世家子 / 084

第六章 请名家 找新才 / 091

- 一、非巨子不足以服膺士林 / 091
 - 陈寅恪与史语所 / 091
 - 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 095
- 二、杜鹃啼归 / 096
 - 胡厚宣背弃师门 / 096
 - 割肉啖人，心痛何似 / 098
 - 找新才的艰难尝试 / 100
 - 王铃与李约瑟 / 103
- 三、栗峰书院的北大文研所 / 105
 - 昆明恢复招生 / 106
 - 栗峰书院的北大文研所 / 107
 - 未进过校门的北大生 / 108

第七章 六同别录 / 116

- 一、无中生有著新史 / 118
 - 清史“档案派”大家李光涛 / 119
 - 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 / 122
- 二、实现语言科学的国际化 / 123

“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 124

马学良：撒尼山寨寻宝人 / 128

董同龢著“天书” / 130

三、人类学的拓荒发轫 / 132

凌纯声、芮逸夫——中国民族学的双子星座 / 132

吴定良——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奠基人 / 137

四、锄头上建立的现代考古 / 141

彭山汉墓发掘 / 141

从抚琴台到蜀王陵 / 144

梁思永——病榻上的硬脊梁 / 145

吴金鼎——田野考古第一人 / 150

夏鼐的西北行 / 153

第八章 张家祠堂与中央博物院 / 159

一、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 160

二、中博院总干事曾昭燏 / 166

三、马长寿——开“川康民族考察”之先河 / 167

四、李霖灿与东巴文化研究 / 170

五、谭旦间的民间手工业调查 / 174

第九章 娶个太太待俺亲 / 178

一、第一个成功是逮卓亭 / 180

二、景云，你在他乡还好吗？ / 183

三、爬山豆，叶叶长 / 188

四、素莹光涛乐未央 / 192

第十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 195

一、从社会调查到社会科学研究 / 196

二、石崖湾与门官田 / 198

三、不拘一格降人才 / 202

四、过尽千帆皆不是 / 205

第十一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 / 210

一、中国现代建筑科学的摇篮 / 210

二、李庄的“太太的客厅” / 216

第十二章 风雨同济 / 225

一、东岳庙与工学院 / 225

二、禹王宫校本部 / 228

三、天下同济 / 234

第十三章 念兹别离,永怀缱绻 / 237

一、抗战胜利 / 237

二、傅斯年代长北大 / 238

三、东迈在途 / 240

四、留别栗峰 / 242

五、羊街八号 / 243

六、去留徘徊 / 248

七、永怀缱绻 / 258

尾 声 / 265

后 记 / 266

主要人物介绍 / 269

中国在经历了十个春秋之后，到 1936 年和 1937 年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还普遍存在着低效率和腐败现象，但是，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和领土上正日趋合一，其程度，至少从 1915 年以来是没有过的。中国在许多方面正呈现出现代国家的特征。例如，重新制定了新的法律条文，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多数已被废除。尤其是教育制度的发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在 1931 年至 1937 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 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 94%。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货币第一次得到统一。^①

国民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这十年中的一颗耀眼明珠。中研院于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先是隶属大学院，后直隶国民政府，总办事处设在南京。中研院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设立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历史语言、社会科学、心理九个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为动植物研究所）。

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是中研院中规模和成就都最大的一个所。从1928年成立到1937年近十年间，十五次河南安阳发掘和三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了大量国宝，使纪元前约一千四百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进展；在中国东部和西南地区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并开始在现代化的语音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

1932年3月，法兰西学院将“儒莲奖”授予史语所，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方面多年艰辛的努力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赵元任等翻译其《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序里说：“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工程何其之大，一个西洋人能做什么？现在已经不是时候了！”

史语所原在北平北海静心斋，“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南迁。先是迁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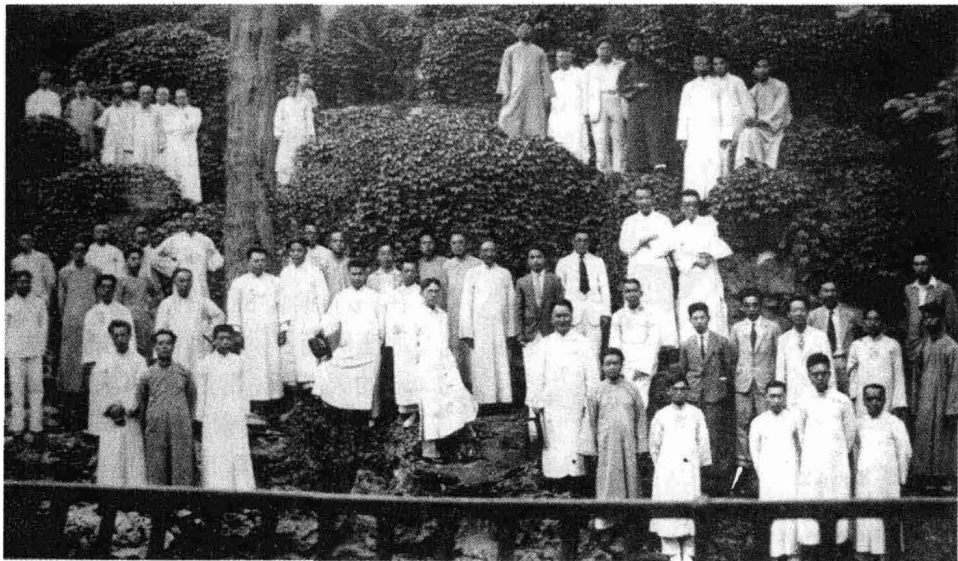


1930年中研院首届院务会。（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后来迁回南京新落成的北极阁中研院办公楼。本欲安居乐业,三年之后竟又要迁徙。一首南宋文天祥的《金陵驿》,竟成为几百年后又一代知识人离别南京的心理写照。诗曰: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首都南京的文化地标——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1933年4月在南京中山门内挂牌成立。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任筹备处首任主任。按7月6日公布的中博院“暂行规则”,宗旨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其任务是“系统的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并说明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现代工艺之材料与标本”。^②傅斯年延请翁文灏、李济、周仁分别担任自然馆、人文馆和工艺馆筹备专员。



一次“不可多得的盛会”。1931年春,史语所同仁会同北平学术界部分人士,为欢迎蔡元培院长北上视察,在所址北海静心斋沁泉廊畔的合影。大树右边(由下至上,由右至左)第一排(5人)李家瑞、罗常培、杨时逢、○○○、董作宾;第二排(10人)王湘、唐钺、赵元任、○○○、○○○、容庚、李济、萧纶徽、○○○、马衡;第三排(14人)梁思永、李方桂、胡适(执扇者)徐炳昶、刘屿霞、吴亚农、蔡元培、徐中舒、程霖、○○○、○○○、李永年、○○○、汪和宗;第四排(9人,山坡上):陈钝、陈槃、李光宇、顾颉刚、傅斯年、袁善元、丁山、(树旁两人)王在德、○○○。大树左边(由下至上,由右至左)第一排(3人)傅乐焕、郭宝钧、○○○;第二排(3人)陈垣、○○○、李景琳;第三排(6人)○○○、○○○、潘恂、刘半农、○○○、○○○;第四排(7人,山坡上)○○○、○○○、朱希祖、○○○、周英学(女)、李晋华、○○○。李光谟提供图片及文字说明

1934年7月,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接任中博院主任,并开始了博物院在南京的选址建设事宜。随着一期建筑工程开工的鞭炮响起,中博院的文物采集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们先后接收了原藏于奉天及热河行宫和北平历史博物馆的大批文物,购进了闵侯何氏“绘园”、东莞容氏“颂斋”、庐江刘氏“善斋”等地的古物,接收了瑞典人斯文赫定及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的文物和标本;一些民间收藏家,也在国家名义的感召下,开始奉献行动。倘若假以时日,代表东方文明的一座国家博物馆将屹立在南京城。



中博院仿辽式建筑,现为南京博物院办公室。岱峻摄

“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中中止了中博院建设的进程。首都告急,已经完成四分之三的中博院一期工程被迫停工,收存的文物紧急装箱,待命转运……

1937年6月,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又一次去山西五台山考察。他们骑着骡子,颠簸在荒凉的山道上,试图寻访一处见诸敦煌壁画,却早已湮没的古庙——佛光寺。7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了那座破庙。梁思成林徽因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中摸索着测量。林徽因突然发现大梁下面有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那就是大殿建于唐后期的确凿证据。这是当时所知我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当他们满怀喜悦走出深山时,扑向他们的却是卢沟桥事变的惊天烟云!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清华毕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梁思成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测绘的“五台山佛光寺佛殿主像”。
载《中国营造学社汇集》。(李庄镇提供)

夫妇先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1930年2月,在朱启铃倡导下,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梁思成担任了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为校理。营造学社是一个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民间学术组织,主办者朱启铃曾为清末民初的内政部长,专门负责修缮北京的皇宫、城门和一些古建筑。营造学社的首选目标是实测北京故宫。梁思成先是手执清廷《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实测北京故宫,对着实物,求教老工匠,从局部到整体,逐步辨识中国古建筑。然后到河北蓟县,开展了以唐代建筑独乐寺为发端的大规模古建筑实地考察。此后,梁思成夫妇和刘敦桢等人,连续几年开展了大规模的古建筑实地测绘考察,范围遍及华北、中原及江南……

1937年7月底,梁思成夫妇赶回北平,收到“东亚共荣协会”寄来的请柬,他们意识到,要不当汉奸,必须赶快逃离。9月的一天,梁思成夫妇带着一家人仓促上路。同行的还有好友金岳霖和清华的另外两个教授。

诗界领袖陈三立感时伤世,义愤绝食,于9月24日卒于北平。史语所一组主任陈寅恪服父丧滞留,不能随同人南迁。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曾向我讲述当时的情景:

祖父咽气时全家均跪在老人床旁送别:父亲一辈在最前面,我和小彭安排在最后,已靠近卧室门口。因五伯父隆恪、七叔父方恪未到,丧事先由父亲主持。全家大小一律穿黑布孝衣,棺木停在供奉祖先位置,当有亲友来吊唁时,后辈分男左女右在白布帘内还礼,左侧由父亲及八叔跪在前,



1937年吴淞同济大学S.K.毕业男生合影(同济校史办提供)